

名、家、导、读、古、典、名、著、系、列

水祥傳

【明】施耐庵、著

文化藝術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名、家、导、读、古、典、名、著、系、列

水祥傳

【明】施耐庵、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浒传/ (明) 施耐庵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2. 12

(名家导读古典名著系列)

ISBN 978-7-5039-5509-9

I. ①水… II. ①施…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5109 号

水浒传

(名家导读古典名著系列)

著 者 施耐庵

责任编辑 潘 艳

装帧设计 马夕雯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 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26.125

字 数 6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5509-9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施耐庵和他的《水浒传》

宁宗一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出现，是一个奇特的现象。

这两部小说，一写山林草莽，一写据地称雄，都把英雄的豪气作了深刻而富有社会意义的描写。尽管这两部长篇巨著的美学风格与气韵风味迥不相同，然而却都是共同生根在中国土地上，并吸取了中国文化的深厚滋养而成长起来的两株参天大树。

看《水浒传》，我们会感到一种粗犷刚劲的艺术气氛扑面而来，有如深山大泽吹来的一股雄风，使人顿生凛然荡胸之感。它豪情惊世，不愧是与我国伟大祖国相称的巨著。据我们所知，在世界小说史上还罕有这样倾向鲜明、规模巨大的描写人民群众的抗暴斗争的长篇小说。

《水浒传》的成书经过和作者

《水浒传》的诞生不是偶然的。首先，它是伟大的人民群众抗暴斗争现实的产物；同时，也是人民群众抗暴斗争的精神成果。

宋江等36人为首的起义是《水浒传》创作的主要依据。北宋末年，我国曾经发生过多次群众起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两

次：一次是方腊所领导的；一次是宋江所领导的。方腊所领导的起义在南方，活动地区在河北、山东、河南、江苏等省交接的地带。这两次起义差不多同时发生，后来都由于宋朝政府的镇压而失败。

关于宋江为首领的起义事迹，在《宋史·张叔夜传》、《东都事略·侯蒙传》等史书中，曾有过简略记载，另据记载，说宋江投降后曾参加过征方腊之役。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知道这支起义队伍人数不多，战斗力却很强，他们纵横转战，所向披靡，锐不可当，曾经给宋王朝造成一定威胁。

宋江领导的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然而名垂千古的英雄事迹和英雄形象却一直铭记在广大人民的心里。在《水浒传》成书的两百年前，宋江等英雄人物的故事已经在民间广泛流传，他们反抗朝廷的事迹还被染上了非常浓厚的传奇色彩。特别是南宋以来，社会矛盾激化，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遭受着重重的压迫，内心有着种种不平，因而在描绘和讲述那些“劫富济贫”、“抱打不平”的“草泽英雄”时，往往寄托了自己反抗暴政和残酷剥削的愿望，同时也用自己的斗争经验和事迹来丰富和补充宋江等人的起义故事，创造群众自己理想的英雄形象。

水浒故事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时候，也正是“说话”、“杂剧”等通俗文艺逐渐发展到成熟的时期。宋江起义故事很自然地成为民间艺人们讲述、演唱的重要题材。从南宋人罗烨的《醉翁谈录》中“小说开辟”条所记当时“说话”目录看，已有“公案类：石头孙立”、“朴刀类：青面兽”、“杆棒类：花和尚、武行者”等，这当是说的孙立、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这说明了在南宋时，说话人已经根据民间关于宋江等人的传说，编出了有系统的故事。南宋民间关于宋江等人的传说，编出了有系统的

故事。南宋末有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序里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并说在龚开之前有画院待诏李嵩，曾画过宋江等人像。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遗事》，它或出于元人，或为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它涉及水浒故事的部分，虽内容粗略，可能只是说书人的提纲，但给我们展示了《水浒传》的原始面貌，是现传讲说水浒故事的最早的“话本”。其中关于“梁山冻聚义本末”的叙述中，已有劫取生辰纲、杨志卖刀、宋江私放晁盖、刘唐下书、宋江杀阎婆惜、玄女庙得天书，直到受招安平方腊等事，这些已与《水浒传》的情节片断基本一致，并且已有了“天罡星三十六人”姓名。

在元杂剧里，有不少水浒传。它使水浒故事和英雄人物的创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对李逵、宋江、燕青等已有生动的描绘，对梁山泊的描写更趋具体，反映了民众的切身感受和爱憎及理想，梁山人物已由 36 人扩展为“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半垓来的小喽罗”了。这说明民间文艺家对于民众起义斗争的历史和英雄人物给予了极大的热爱。

元末群众性的反抗运动风起云涌，激荡全国。从 1334 年山东益都、河北真定的农民暴动，直到 1351 年刘福通、郭子兴、张士诚等先后起义。在这风雷激荡的日子里，水浒故事对于斗争中的人民起着特殊的作用。一方面，在群众的精神生活中盛传着起义英雄的抗暴故事，他们从水浒英雄的斗争事迹中吸取力量和反抗勇气；另一方面，在严峻的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又不断丰富着水浒英雄的故事。时代迫切地产生了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来反映群众性抗暴斗争事迹的要求。

元末明初的作家施耐庵担起了这项历史使命。他在长期积累的群众性创作基础上，以同情人民群众抗暴斗争的思想观点和关于元末频系的民变的实际知识，把那些表现在口头传说、杂剧、

话本中彼此不联缀的水浒故事集中起来，进行创造性的艺术构思，给水浒故事以更细致更集中更典型的描写，使作品体现更广泛的社会内容，艺术上也有了极大的提高，最后编纂成《水浒传》这部熔铸了宋元时代人民和人民艺术家心血的长篇巨著。

关于施耐庵的生平事迹，不见更传。1949年后，有关部门曾对施耐庵生平进行了一次调查，至少证明了施耐庵是实有其人。民间传说他曾参加过元末张士诚的起义，并和其部将卞元亨为好友。有的研究者推测，施耐庵大约是为“书会”执笔的下层知识分子。至于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的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因存在真伪问题，学术界意见颇不一致，所以尚待进一步研究。

人民反抗斗争的历史画卷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依据自己对元末明初民众抗暴斗争的亲身体验，把草泽英雄推上了舞台，叙写了“乱自上作”、“官逼民反”的过程，这就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反映了宋元之际的社会生活。作者以“一百零八将”为重点，以梁山泊起义的发生、发展、高潮、衰落和失败为轴心，上至昏君佞臣，下至村野细民，从城镇到农村，触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揭示了社会现实的黑暗，反映了群众性抗暴斗争的正义性和人民的社会理想。

《水浒传》结构上的主线，就是起义的英雄人物怎样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梁山泊，形成一支强大的武装部队同宋朝政府对抗。在长篇结构的开端，为了突出“乱由上作”和“官逼民反”，作者首先把抨击的矛头，直指宋王朝的皇帝宋徽宗赵佶。正是在这个浪子皇帝的怂恿下，以高俅、蔡京、童贯、杨戩等“六贼”为首的统治集团把持朝政，狼狈为奸，卖官鬻爵，残害忠良，鱼肉

人民，欺压良善，无恶不作。高俅这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只因踢得好气球，受到皇帝的青睐，半年之内就当上了殿帅府太尉。他像一根无形的黑线，把出现在书中的那些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大小小贪官污吏全部串联起来。“专一爱淫垢人家妻女”的高衙内是它的螟蛉之子；“依仗哥哥势力”而“无所不为”的高唐州知州高廉是他的叔伯兄弟；蔡京、童贯是他在朝廷上狼狈为奸的朋党。另外，江州知府蔡得章是蔡京的儿子，“为官贪滥”、“作事骄奢”；蔡京的门人华州贺太守，更是个“非理害民”的家伙。再加上青州知府慕容彦达、清风寨知寨刘高等人，在统治集团中织成一片黑暗的统治网，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榨和迫害。王进亡命延安府、林冲刺配沧州道、杨志流落汴京城，都是由高俅迫害的结果。

此外，《水浒传》中还写了一大批布满社会基层的剥削者、压迫者的丑恶形象，如毒死武大、霸占潘金莲的西门庆；为一只虎而讹诈猎户解珍、解宝的毛太公；骗娶卖唱女子金翠莲，蹂躏后又抛弃，还要追讨典身钱的郑屠；还有祝朝奉和曾长者等等。至于那些为虎作伥、见钱眼开的差拨、役吏，更是形形色色，不一而足。这样一群社会压迫阶级，残暴压迫，肆意掠夺，横行无忌，使得整个社会暗无天日，人民饥寒交迫，痛苦不堪。“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小说中引的这首民歌深刻地道出了当时社会矛盾的日趋激化。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就是在当时黑暗的封建统治下，在忍无可忍的情势下，人民群众的造反精神像火山一样地迸发出来了，并以势不可当的冲击力，揭开了反抗宋王朝的斗争帷幕。“农夫背上添心号，渔夫舟中插认旗”，被压迫的老百姓高举造反的战旗，和统治集团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大

搏斗。

到处是抗暴烈火在燃烧，到处是民变风暴在呼啸！除梁山泊以外，还有少华山、桃花山、二龙山、对影山等多处起义，东至山东，西到华山、南至江州，北到蓟州，遥相呼应，相互配合，最后，从四面八方汇合成一股汹涌澎湃、波澜壮阔的斗争洪流。武装斗争的风暴猛烈地冲击着封建秩序，震撼着宋王朝。

小说正是通过展示这幅规模宏大、惊心动魄的人民抗暴斗争的历史画卷，倾向鲜明地歌颂了群众英雄。作者笔下的李逵、阮氏三雄、石秀、李俊、张横、张顺、解珍、解宝都是在赤贫的生活环境中严酷的斗争中培养起来的“不怕官司不怕天”的斗争性格的。李逵对梁山泊起义事业赤胆忠心，万苦不辞，奋战到底。他对宋王朝的最高统治集团深切痛恨，斗争激烈而高昂。虽然他性格莽撞、急躁，又有不讲策略、盲目行动、乱杀乱砍的弱点，但是疾恶如仇、反抗到底的精神却是极可宝贵的品格。他上梁山非常主动，没有丝毫的勉强，闹江州后，当宋江等提出上梁山时，是他第一个响应，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吃我一鸟斧，砍做两截便罢！”他对宋王朝从不抱幻想，什么官府衙门，法律制度，他都予以否定。就是宋朝皇帝的宝座，他也不放在眼里，一上梁山就提出：“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作者充满激情的笔触下，李逵是藐视封建王法“尊严”的顶天立地的英雄。

“官逼民反”有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小说着力描写的鲁智深，虽然做过下级军官，但是，他对于他生存的现实，他所看到的不合理的社会压迫，燃烧着强烈的仇恨的火焰。他为了救金氏父女犯下血案，无可奈何藏身于寺院；为了搭救林冲，而受高俅迫害，连和尚也做不成，只好到二龙山“落草”。所以，鲁智深是为伸张正义而受到统治集团的迫害，最后走上了起义的道路

的。武松与鲁智深不同之处，则是从自身所受的血的教训中逐渐觉醒过来的。他最初受到城市小私有者的思想影响，个人意识强，私人恩仇观念重。为哥哥武大郎雪冤，事前告状，事后自首；充军到孟州府后，又被施恩利用，大打出手。直到遭张都监诬陷，这才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在刀光剑影的生死搏斗中，他的怨怒之情才转化为反抗力量。从此以后，武松与压迫阶级势不两立，成为为抗暴斗争甘愿赴汤蹈火的英雄。

至于豹子头林冲，本来是东京八十万禁军中的一个枪棒教头，社会地位并不算低，但是，也难免统治集团中当权派的迫害。明杀暗害，一连串的阴谋都倾泻到他头上，不反抗，就死亡。林冲是在家破人亡、无地容身的绝境中，爆发了反抗的怒火，拿起武器，踏上反抗暴政的道路的。林冲正是从血泊恨海中挺身出来的，所以他最终以坚定的造反者的形象屹立在水浒英雄的行列中。

群众性的抗暴斗争和此伏彼起的民变，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使统治集团营垒的链条出现了裂痕和缺口，内部开始出现了分化的现象，以至像有“丹书铁券”的世袭贵族柴进、将门后裔杨志、大地主卢俊义等，也都相继卷进了起义的队伍。这说明，在激烈动荡的社会现实里，起义有席卷一切的威势，就是不想反抗的，在急风骤雨的抗暴斗争的影响下，只好在进退不得、中立不能的处境里，被卷入到起义的漩涡中来。

值得注意的是，《水浒传》极其真实地再现了群众性的起义队伍的形成过程。如鲁智深与镇关西的对立，林冲与高俅父子的对立，武松与西门庆、张都监等的对立，虽然都具有阶级冲突的性质，但还属于个人反抗；“智取生辰纲”是最初的联合斗争，但还是属于小规模的反剥削压迫的斗争。随着反抗斗争的深化，起义事业的发展，涓涓细流，汇成浩瀚的江河，斗争规模发生了

质的变化，它不再是三拳打死镇关西，也不再是风雪山神庙、血溅鸳鸯楼，而是攻城夺府，夺取政权了。

然而，伴随着起义队伍的扩大，起义军内部陆续参加的既有投机分子，也有被俘的投降的政府军官，他们必然用自己的思想影响起义队伍。这样，起义军中合乎规律地产生了两种思想的撞击。另外，宋王朝在实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又采取了招安政策。这一政策，在梁山义军内不可能不产生强烈的反映。具体就表现为接受招安和反招安的尖锐对立。这一对立集中表现在起义军领袖宋江的身上。

宋江虽然曾在郓城县作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但却并非一般官吏的爪牙。他讲义气，同情人民疾苦，憎恨贪官污吏，“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因为好“济人贫苦，赈人之急，扶人之困”，被称为“及时雨”，深受群众爱戴。他接近下层人民，“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所以同情起义英雄，生辰纲事发，他冒着生命危险给晁盖通风报信。由于所处的地位，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加之贪官污吏的屡屡迫害，更增加了他对统治集团的强烈不满。浔阳楼题反诗以后，受到统治集团进一步的迫害，是梁山英雄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从刀口下救了出来，他才终于下定了反抗的决心，卷入人民抗暴的浪潮里。

上梁山以后，在一段时间内，宋江采取了“散粮救民”等积极措施，分化了敌人，壮大了水浒义军，并且站在反抗暴政的最前列，领导起义军向统治集团展开猛烈的武装进攻，取得了击溃宋王朝多次围剿和粉碎地方武装的辉煌战果。

然而宋江对于皇帝和封建秩序始终抱有幻想，认为政治的黑暗乃是“奸臣闭塞”的结果。他放走了晁盖，却认为他们杀了公人，打败官军是“于法度上却饶不得”的“灭九族的勾当”，这

就说明他的仗义任侠也仍超不出承认皇帝统治是正统的这个观念范畴。逼上梁山以后，宋江对统治集团的幻想和妥协，仍然没有放弃，一再声称逼上梁山是为了“权借水泊，暂时避难”，“专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所以对宋王朝只是“替天行道，并无异心”。

受招安的思想就是这样始终贯串在宋江的行动中，尽管义军中的几个坚定的骨干人物，如李逵、鲁智深、武松等出面反对，对宋江的决策表示强烈的反感；但是，随着起义事业的兴旺发展，降官降将以及大量从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来的人物越来越多地反上梁山，他们的不得已的、一有机会就要去“再理会本身的勾当”的思想，和宋江的受招安的思想一拍即合，这就更加重了宋江思想的动摇性，并在以后的领导路线上显示了强烈的反映。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宋江既是起义事业发展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又是起义事业走向衰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宋江正是把思想中的一切复杂矛盾带到起义阵营来，而且又都始终交织在他的行动里，表现在他的领导路线上。从宋江这种矛盾的思想立场中，我们已经预感到起义军的历史悲剧了。

《水浒传》的作者写了水浒义军最终走上了受招安的道路，招安以后又去打王庆、田虎、方腊，终于成了宋王朝统治集团的奴才。当他们得胜还朝时，108人只剩下27人。而这27个人表面上受到封诰，实际上却一个个仍不免死于非命。宋江饮了放有毒药的御酒而死，卢俊义吃了放有水银的御膳而丧生……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群众的起义，终于土崩瓦解。在作者歌颂招安的同时，宋王朝的昏暗与腐败却依然其旧，所以作者又陷入了深深的思想矛盾之中；既歌颂了宋江“男子平生志已酬”，又为“谗臣贱子尚依然”而感喟不已，在“落花啼鸟总关愁”的悲凉情调中结束了他的作品。

这是一段史实，作者据此敷衍开来，表现了宋江这位忠君而不得好报的悲剧人物。

“替天行道”与“忠义”思想

作者在“单道梁山泊好处”这篇言语里描绘了一幅理想的生活图画：“八方共域，异姓一家”，“都一般儿兄弟称呼，不分贵贱”。这是要求政治上的平等和经济上的平均，无疑是正当的和进步的理想。然而这些纲领总是空想的部分多于现实的部分，在封建社会关系中，毕竟还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

《水浒传》除了提出“平等”和“平均”的思想外，还提出了“替天行道”的口号。行什么“道”呢？小说写得很分明，是行“忠义”之道，即所谓“常怀忠义常贞烈，不爱资财不抚民”。这样，“忠义”就成了《水浒传》所要大力表现的中心思想之一了。

在《水浒传》中，“忠”和“义”的口号是连在一起的，但内容却不同。《水浒传》中的英雄实行的“义”字的实际内容，除了他们相互间亲如兄弟、誓同生死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一面，即“仗义疏财”、“劫富济贫”、“取不义之财”以“济困扶老”、“路见不平，拔刀而起”，以及誓向迫害者报仇雪恨等等。这种“义”是人民群众在抗暴斗争中产生的一种道德观念，它主要是建立在起义人民共同反抗统治集团的基础上的，其基本性质是起义军团结、友爱、反抗的手段。因此，这种“义”，曾经起过号召人民进行抗暴斗争的作用，如东溪村七星小聚义，是为了夺取生辰纲不义之财；白龙庙英雄小聚义，是进行大规模反抗斗争的前奏和预演；而梁山英雄大聚义，则是为了实现“替天行道”的政治目标所举行的誓师会。至于他们的攻城夺县、抗击官府，是

为民除害；“散粮救民”、消灭祝家庄、曾头市的恶霸地主，就更是解除百姓负担的正义行动。所以“义”对于水浒英雄来说并非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很多时候，“义”的概念与反抗压迫的意思相通。“义”与“不义”意即是否同情与支持被压迫被剥削者，是否参加与坚持反暴斗争。所以，“义”是起义英雄社会行为的准绳。不义的人和不应义的事，是不能见容于水浒起义的纪律的，即使对于义军的内部亦是如此。因此，《水浒传》中的“义”，从其基本思想和主导倾向来看，它体现的是起义英雄之间建立在共同反抗统治集团的基础之上的政治关系。

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以及封建道德的影响，在《水浒传》中也经常把大义和小义，尽义于私，尽义于个人和尽义于起义事业混淆起来，不加区别地加以肯定和歌颂。比如，武松为报施恩的“知遇之恩”所表现的“义”，显然就是小义，就是尽义于个人。至于武松受张都监的小恩小惠，就愿意为他死心塌地地效劳，这种“义”纯粹是为报私人的恩德，失去了原则，不仅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恰恰是违反人民的利益，这又可以看出“义”这个概念很容易模糊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

总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死生相托、患难相扶、济困扶危的“江湖义气”，固然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的反封建压迫，但是这种个人之间的互助终究是有局限的，它不是真正阶级、集团的觉悟。所以人民群众最后总是要打破个人之间的施恩和报恩的局限，团结起来，向压迫者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

在水浒英雄的思想里，尤为复杂的是和“义”相连的“忠”的观念。照水浒英雄在梁山泊的实际行动看，他们反对“滥官污吏”，反对恶霸地主，反对“奸臣”。但是，混杂着各种出身的人物的水浒起义军，他们的“忠”的观念有很大区别，对“忠”的理解很不一样。像李逵，对于那个“赵官家”就没有什么留恋，

大宋皇帝的“鸟位”，更不在他眼里，因此，对于他来说，“忠”只表现为对梁山起义事业的忠诚。

宋江的“忠”的观念就和李逵等截然不同。他一当上梁山首领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厅”，这不仅是一字之差，而是篡改了梁山好汉聚义的性质和注入“受招安”的因素。此后，宋江的一系列行动都说明，他的“忠”是对宋王朝的“忠”即所谓“为国家出力”，“尽忠报国”，以便图个“荫子封妻”、“光耀祖宗”，这显然是落后的，是属于为统治集团服务的封建伦理道德的范畴。更为复杂的是，不少出身下层的义军英雄中，也存在着忠君思想。他们在聚义反抗统治集团的武装斗争中，却不能彻底否定皇权。比如出身渔民的反抗很坚决的阮小五、阮小七，在他們和官府的第一次交锋时唱的是：“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本来，有所忠也就有所不忠。忠于皇帝就不能忠于造反，忠于起义也就不能忠于皇帝。杀尽滥官污吏和“忠心报答赵官家”，本来是互相矛盾的思想，但是在不少水浒英雄看来却是统一的。这种思想的矛盾，是起义队伍走上受招安悲剧道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水浒传》的题旨，触及了封建社会里“忠君”这个延续千古的政治道德问题。它的深层意蕴就在于通过宋江等人物的人生转向，读者可以一嚼封建社会中挣脱羁绊又复归牢笼的生命抗争反复回旋的况味。

《水浒传》的民族美学风格

《水浒传》反映了时代的风貌，也铸造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它线条粗犷，不事雕琢，甚至略有仓促，但让人读后心在跳，血在流，透出一股迫人的热气：这就是它的豪放美、粗犷美。它没

有丝毫的脂粉气、绮靡气，而独具雄伟劲直的阳刚之美和气势。作者手中的笔如一把凿子，他的小说是凿出来的石刻，明快而雄劲。它的美的形态特点是气势。这种美的形态是从宏伟的力量、崇高的精神显现出来的，它引起人们十分强烈的情感：或能促人奋发昂扬，或能迫人扼腕悲愤，或能令人仰天长啸、慷慨悲歌，或能教人刚毅沉郁、壮怀激烈。《水浒传》的气势美，就在于它显现了人类精神面貌的气势，而小说作者所以表达了这种气势美，正是由于他对生活中的气势美有独到的领略能力，并能将它变形为小说的气势美。

《水浒传》标志着一种英雄风尚。这种英雄文学最有价值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传奇性。我们很难忘却李逵、武松、鲁智深、林冲这些叱咤风云的传奇英雄人物。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刚毅、蛮勇、有力量、有血性的世界。这些主人公当然不是文化上的巨人，但他们是性格上的巨人。这些刚毅果敢的人，富于个性，敏于行动，无论作什么，都是无作顾忌、勇往直前、至死方休。在他们的传奇故事里，人物多是不怕流血、蔑视死亡、有非凡的自制；他们几乎都是气势磅礴、恢宏雄健，给人以力的感召。这表现了作者的一种气度，即对力的崇拜，对勇的追求，对激情的礼赞。它使你看到的是刚性的雄风，是男性的严峻的美。这美，就是意志、热情和不断的追求。

《水浒传》的这些美学风格得以出色体现，是缘于作者美的传达和美的表现的艺术技巧。

水浒英雄形象的塑造的成功，是作品具有光辉艺术生命的重要因素。前人曾有所谓一百零八人，人人面目不同的说法，这话未免言之过甚，不过全书至少有一二十个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这些典型形象和其他许多有血有肉的形象组成了它的小说人物画廊。

在人物塑造方面，作者运用现实主义艺术方法把英雄人物放置在典型环境中，从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集中地刻画起义英雄的性格特征。鲁智深的疾恶如仇、见义勇为的侠义精神和直爽粗犷、英勇豪迈的性格，是通过三拳打死镇关西、大闹桃花村、火烧瓦官寺、大闹野猪林等一连串激烈冲突突现出来的。武松的刚毅不阿的性格和机警、泼辣、光明磊落的英雄品质，是通过连续出现的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严峻的斗争确立的。作者正是把英雄人物放在冲突的焦点上，并以他为矛盾冲突的中心，随着矛盾冲突的层层推进，环环紧扣，冲突步步激化，一浪接一浪，逐步把这些英雄好汉丰富的性格特征、英雄本色揭示出来。

同时，《水浒传》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表现了强烈的理想色彩。比如作者对一些草莽英雄痛苦生活的艺术画面，就着色不多；相反，他把自己的艺术雕刀，集中在反抗性格的刻画上，使这些英雄好汉的形象更加完美，成为理想的群众英雄的化身。以林冲和鲁智深来比较，他们同是军官出身，但作为体现人民理想的英雄，鲁智深无疑比林冲更理想化了。倒拔垂杨柳，棒打赤松树，作者的描写处处带有理想性的夸张。而唯其夸张了，鲁智深的疾恶如仇、见义勇为的英雄性格才得到更强烈地表现，从而成为那个时代英雄品格的理想典型，几百年来一直为人民群众所热爱。

《水浒传》充分吸取了民间文学的丰富营养，直接继承了“说话”艺术的优良传统，并有了新的发展。“说话”由于要说给人听，它必须一下子抓住听众的注意力，并且一回又一回地“粘”住不放，因而特别忌讳孤立、静止、冗长的关于外貌、风景、心理的描写；而是在人物所参与的事件的开展中，在决定人物命运的矛盾冲突中，适应事件或斗争的需要，通过人物本身的